臺大歷史學報第32期
2003年12月，頁331~344

BIBLID1012-8514(2003)32p.331-344
2003.4.2收稿，2003.10.13通過刊登

§研究討論§

多元與辯證的時間觀

——讀費爾南．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歷史和社會科學：長時段〉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longue Duree”）

徐　梓*

提　要

歷史是時間的科學，但是如何處理時間的問題，一直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直到勃羅代爾提出他的時間觀，才有了較具說服力的說法。眾所周知，勃氏乃年鑑學派的一代大師，他清楚地將該學派的時間觀加以理論化及系統化，亦即提出了短時段、中時段及長時段的歷史時間觀，與之對應的為事件的、政經趨勢匯流的，以及長時期結構性的，從此三種時間觀來觀察分析歷史現象，歷史時間不再是平面或直線的，而是三度空間立體式的；換言之，藉由勃氏的時間觀，使得史家較能夠處理歷史的問題。本文即是對此歷史時間觀的介紹。

關鍵詞：勃羅代爾　年鑑學派　社會史　時間觀

* 北京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副教授。

在現代西方史壇上，法國年鑑學派可以說是最具特色、最有生氣的一支隊伍。從一九二九年《經濟社會史年鑑》的創刊，到今天已經有七十多個年頭了。這段時間，它以一分雜誌、兩個機構、三代人韌性的努力，從最初法國邊緣地區、邊緣學校、幾個邊緣地位的教授們的活動，逐步走向巴黎，走出法國，硬是「奪得了幾乎一統天下的地位」。[1]「在這個世紀的史學研究上，沒有一個學者群體有過比『編年史學派』的歷史學家們更大的影響，或更有成效。」[2]特別是在一九四五到一九六七年間，更是充當了世界歷史學的霸主。[3]在人類正經歷著有史以來最為瞬息萬變的境遇、各學術流派旋生旋滅的當代，它總是肩扛大旗領導著世界史學的新潮流。

年鑑派持久的魅力，固然在於它的薪火承傳、代不乏人，更重要的在於那些「新史學的鬥士們」，在繼承前一代的遺產時，並不只是因襲和固守，而總是有所創新和添加，用自己的智慧增益其豐厚。比如，對於奠基創業的第一代，第二代的主將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就做到了這種超越。當他的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面世時，第一代的費弗爾（Lucien Febvre，1878~1956）為它所寫的評論，就直接以「走向另一種歷史」為標題，稱頌它開闢了新的視界，具有革命的性質。後他一代的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在全面介紹這一學派的《新史學》一文中，也高揚勃羅代爾把歷史研究

1 E. L. 拉杜里，〈新史學的鬥士們〉，《世界歷史譯叢》1980 年第 4 期（北京）。

2 《二十世紀思想家辭典：生平．著作．評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84。

3 雖然早在一九七六年，汪榮祖先生就在《食貨》月刊上發表了〈白爾德與當代法國史學〉這樣的文章，但臺灣地區開始集中譯介和論述勃羅代爾，始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如在賴建誠，〈臺灣對布勞代爾的介紹與理解〉一文所介紹、評介的二十六篇文章，就有二十二篇發表於八十年代，另外四篇則發表於九十年代。該文原載 1992 年 2 月《中國論壇》第 32 卷第 6 期，引自《年鑑學派管窺》（臺北：左岸文化出版公司，2003），213~215。大陸地區則由於顧良等先生的努力，在九十年代陸續出版了《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北京：三聯書店 1992、1993）3 卷、《法蘭西的特性》（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1995、1997）3 冊、《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2 卷三部主要著作及《資本主義論叢》（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的論文集。

引向了新的方向。

費爾南．勃羅代爾究竟把歷史研究引向了什麼方向呢？如果說，他的三部著作——《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法蘭西的特性》——為這一新的方向提供了範例的話，那麼，他的〈歷史和社會科學：長時段〉一文，就可以看作是這一範例的說明書。

一

勃羅代爾飲譽國際史壇，是和他提出的三個層次的歷史時間的概念聯繫在一起的。「對於歷史學家說來，一切以時間為開始，一切以時間為結束」。[4]歷史學家怎麼也逃離不了時間的牢籠，走不出時間的範圍。「時間緊貼在他們的思想上，猶如園丁的小鋤總是沾土一樣。」在勃羅代爾眼裏，時間對於歷史認識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他把它置於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中心。也正是在這裏，勃羅代爾尋找到了對於傳統史學的突破口。

他發現，傳統史學把時間看作是由過去經現在向未來的線性發展。在無始無終的歷史長河中，歷史學家只是關注這個單一過程中的暫態性時刻，捕捉到的就僅僅是事件爆炸時一閃而過的火光，而事情的本質則被淹沒在爆炸所掀起的煙霧中。勃羅代爾堅信能夠獲得一種關於時間含義的新解釋，按照嶄新的標界及其曲線和起伏進行分期，使之適應歷史的需要。

經過長期而辛勤的探研，勃羅代爾發現了關於時限的辯證法，即時刻和時段之間存在著尖銳的、深刻的和反復無窮的對立。這一發現令他極為欣喜，認為「在社會現實中，再也沒有別的東西能比這一對立更加重要」的了。在他的垂暮之年，勃羅代爾也不能忘情於這一發現：「有一天，我體會出：有些歷史是不動的，有些歷史的步驟是緩慢的，最後，

4 勃羅代爾著，承中譯，〈歷史和社會科學：長時段〉，見《史學理論》1987 年第 3 期（1987，北京）。以下未注明出處者，均引自此文。

所有個人史、事件史，這些都很快地就會過去。我因而把時間分解開來，因為歷史的時間並非只是單股流向，而是有百千個層面……，我們是活在許多同時並行而速度不同的歷史中」。[5]正是在這種多元性質的時間概念的基礎上，勃羅代爾確立了三個不同時段的思想。

這三個時段都同特定類型的歷史現實相適應。在全部的人類歷史背後，存在著一種對人類活動通常是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力量，在勃羅代爾看來，這便是土地、氣候、植物、動物和文化。這裏存在著一種幾乎不受時間影響的歷史，一切變化都十分緩慢，它通常以數個世紀為度量單位。這種人與無生命世界交往的歷史，就是長時段的歷史。在這部幾乎靜止不變的歷史之上，有一種慢節奏的歷史，勃羅代爾稱之為社會史，它研究的是經濟制度、國家、社會和文明，在十年、二十年、五年或百年內起伏興衰的現象，猶如海上的漲潮和退潮一樣，具有一定的節奏和周期性。最後便是傳統史學所注重的事件的歷史，這些事件不僅包括普通的生活小事，也包括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它表現為一種短促的時間，恰似海上一朵朵轉瞬即逝的浪花，互相更替，是短暫、迅速、不安而極敏感的波動。

這樣，勃羅代爾把單一性的時間分解成了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體時間，它們被分別稱之為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勃羅代爾進一步指出，對結構、趨勢和事件的關注，正是與相應的時間觀念適應的。針對以往的史學執迷於短時段的個人事件史，最多也僅僅是注意到了中時段的社會經濟史，勃羅代爾特別倡導對長時段歷史的研究。在他看來，長時段是認識歷史過程的基礎，它彷彿是歷史的構架，一切都以這個半處於靜止狀態的深層為轉移，那些紛繁的事件，不過是它最小的震動引起的顫抖。勃羅代爾甚至把對短時段的超越，看作是近百年來史學研究的最珍貴的財富，認為是長時段挽救了歷史科學。

勃羅代爾最偉大的創舉在於長時段的提出，但這不僅僅是一個概念問題，用他的話來說，把這個棘手、複雜、陌生的概念「接納到史學研

5 賴建誠譯，〈史學一生：法國年鑑學派領袖布勞代爾訪問錄〉，《食貨》月刊第 15 卷第 5、6 期（1986，臺北）。

究中來不是件好玩的事。這不是簡單地擴大研究和興趣的範圍，也不僅是對史學研究有利的一種選擇。對歷史學家說來，接受長時段意味著改變作風、立場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觀點去認識社會。」這也就是說，長時段對歷史家意味著一雙新的觀察眼睛、一顆新的感受心靈和一個新的認識頭腦。

以往歷史學最大的偏失，在勃羅代爾看來莫過於偏執短時段。由於專一地關注一時一刻，注意力便完全集中在轟動一時的事件上，不問它從那裏來，更不知到那裏去。歷史好似只是對嘎然而止的一個過程、一個事件進行研究。在這樣的歷史學家看來，一天、一年都是時間的計量單位，無限的時間便是無限個一天或一年的簡單相加，全部的人類歷史就是歷史過程中發生的所有事件的拼湊，歷史的真理寓於歷史的文獻之中。「只要把文獻資料按順序編排起來，歷史事實也就幾乎自動地對號入座。」因此，歷史學家的責任僅僅是在於考證和編排大使通信或議會辯論，亦步亦趨地記述當代所發生的重大事件。

長時段的提出，正是為了克服這種狹隘意識。困守過去或現在都有害於我們的工作和事業，因為「歷史既是過去的科學，又是現實的科學。」專注於現實並不能剖析結構的微末細節，為了更好地掌握現實，就有必要離開現實，追溯它的原始，展望它的未來，借助其他參照系來認識它。這就是說，理解現實的唯一方法，是離開現在並把現在看作是連續過程中的一個部分。也只有在歷史學的領域中，才有能力將現在置於相互關聯之中，從而防止缺乏遠見的近視病。勃羅代爾說：「遠離故土產生的新奇感是認識的重要手段，它能幫你更好地瞭解周圍的事物（距離太近反而看不清楚）。即使你在倫敦住上一年，你對英國的事仍是一知半解。但在新奇感的啟示下，通過比較，你會對法國的某些特點豁然開朗，這正是你拼命認識所認識不到的特點。」環境的改變對歷史的認識有如此重大的作用，相對於現實而言，過去是改變環境的一條途徑，未來也是如此。所以在勃羅代爾看來，歷史是昨天、今天和明天各行各業和各種觀點的集合，是各種可能的歷史的總和。

以這種長遠的眼光來看問題，任何歷史事件也就不再是簡單和孤立

的存在，它受到前承後繼或並行發生的無數其他事件的制約，以至於除非把它放進那個複雜的關係網中，否則它就不具有任何意義，就像一隻與人體分離了的手不再具有人手的功能而不成其為人手一樣。簡單和孤立的事件本身，對於我們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它之所以對我們有意義，是由於它是許許多多其他事件的概括的緣故。概而言之，世界並不一開始就是現在的這個樣子，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它的過去有所瞭解；世界也不會永遠這樣下去，所以我們有必要對它的未來有所把握。只有這樣的胸懷來認識歷史，才能看到人類歷史的過去和未來、春天和秋天，理解人類的命運。

有別於普通的通史，勃羅代爾所謂的總體歷史，不僅體現在時間的長遠上，而且也體現在空間的廣大上。他構成的研究單元，很少是像一個國家那樣的政治實體，而更多的是像地中海那樣浩淼的地區性整體。且不說他《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一書的視界，投射到了包括中國和印度在內的整個世界，還是說他那部成名作吧。人們總以為英文版譯名《十六世紀地中海經濟》傳達不了作者的意旨，而在這個題目前高標「地中海」三字。[6]是的，勃羅代爾眼裏的地中海是非同平常的，「它的性格是錯綜複雜的、難以把握的、又是獨特的。我們無法用通常的標準來衡量它、區分它。簡單的編年傳記寫不出這個海，單純地敘述發生了什麼也不能恰當地表現它的歷史。地中海不是一個單一的海，而是許多海的綜合體，這些海被島嶼所分割，被半島所打斷，又被犬牙交錯的海岸所包圍。它的生命與陸地休戚相關，它的詩意遠遠超出了田園的範圍，它的水手可能季節性地成為農民，正如它是軍艦和商船的海洋一樣，它也是葡萄園和橄欖樹的海洋。」[7]以這樣的深情和眼光來看這個神奇的海洋，所關心的就不只是為島嶼所分割、被半島所打斷和被海岸所包圍的細小片斷，而是表現出通過透視它豐富多彩的個性以見其整體風貌的恢宏識見。以這樣的筆力向人們所展示的地中

6 參見陳彥，〈令法國人引為驕傲的歷史學家〉，《讀書》1986 年第 4 期（北京）。

7 《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版序言。譯文轉引自劉昶，《人心中的歷史》（重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295。

海世界，就不僅包括浩淼的海洋和在其中行進的船隻，也有潮漲潮落的海灘和季節性活動的人們，還有北非一望無際的大漠和南歐逶迤連綿的群山。總之，這是一個裝載它沿岸文明的深邃的海洋。

長時段在時間和空間兩個向度上擴大了歷史的範圍，或者說，把特定的歷史事實鑲嵌在廣闊的背景上。人類的歷史，是一個各個要素密切關聯的整體，我們所說的歷史事件，其實不過是從這個整體上所抽離出的片段。從本來的意義上說，這樣的片段是不能獨立的。從時間上講，在它前面有無數的原因，在它後面有眾多的結果。從空間上說，任何一個再細小的歷史事實，也是眾多更小歷史事實的集合，各個要素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因此，孤立地研究歷史事件，是根本不可能獲得對歷史本質的認識的。在所有的歷史事實都植根於同一個模板的前提下，「一個歷史事實的時空容量越大，或者說與它相關的時空背景越大，它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就越豐富、越深刻。」[8]

二

勃羅代爾寫作這篇長文有一個出人意外的目的，它不是為那些專門從事歷史研究的人而寫的，而是為了人文科學的其他專家，如經濟學家、民族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語言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還有社會數學家或統計學家而寫的。文章以較大的篇幅逐一討論了這些學科的學者對待歷史學的態度。勃羅代爾批評經濟學家困守現實，偏執於此，以至於放棄了一個很好的觀測場所的目光短視；表彰了社會數學（資訊、傳播和定性數學）對建立和完善「模式」的貢獻。他所以這麼做，目的在於消弭社會科學家在各個門類之間的此疆彼界，號召他們從各自的領域內走出來，在互相滲透融合組成的「共同市場」中，通過共同的努力，為今後的集體研究劃定幾條指導性的路線，諸如他在本文中力圖說明其重要性的數學化、地域論和長時段這樣的指導性路線。

8 劉昶，《人心中的歷史》，259。

強調歷史學與鄰近學科的親密合作，是年鑑學派一貫的主張和實踐。我們知道，費弗爾和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5）創辦《社會經濟史年鑑》的目的，就是為了消除歷史學家和從事其他研究的專家之間不相往來的閉塞狀況。這在創刊號卷首的〈告讀者〉中說得明白：「各行的研究家，都致力於自己的專業，在自己的庭院中辛勤勞動，如果他們能再關心一下鄰居的工作，就十全十美了，可是卻被高牆阻隔了。我們之所以站出來大聲疾呼，就是針對這種可怕的分裂。」[9]由此可見，年鑑學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打通各個學科間的相互隔絕，擴展歷史學的研究領域，擴大歷史學家的視野。

那麼，勃羅代爾在這方面又有什麼貢獻呢？首先，自然是他以實踐證實了前一代的主張，使一種高遠的理想得以實現，是他成功地說明了總體歷史在實踐中有可能實現以及如何才能實現，為這類歷史著作的撰寫樹立了榜樣。勃羅代爾的全部著作包括我們現在評議的這篇文章，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就是把人類社會的過去作為一個有眾多要素相互制約的整體，作為從過去經由現在向未來發展變化的全部歷史過程中的一個環節來認識，並且力求從結構和功能的相互依從關係上，來再現處於動態中的歷史現實，根據某一社會制度多重時間的、空間的、人類的、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的和事件的內容，來探研其作用。在他的著作中，綜合性不再僅僅是遙遠的地平線，而是切近的寫作原則。

勃羅代爾以一種近乎悲觀的情感體會到，事件是很難掌握的東西，任何一個看起來特殊的事件，都是和整體聯繫在一起的。以為歷史學家能不費力氣地從過去的時代中抽出某一事件，並用肯定的方式來加以解釋，那顯然沒有感覺出這門行業的龐大性，因為只有總體歷史才算是歷史。「對我來說，只有一種『綜合科學』，要是我辦分期刊的話，我就取這個名字。」[10]他相信，在各門科學的共同市場正在形成的當代，我們肯定會遇到一些共同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就有必要把各門科

9 引自井上幸治，〈年鑑學派成立的基礎——昂利．貝爾在法國史學史中的地位〉，《國外社會科學》1980 年第 6 期（北京）。

10 同註4。

學綜合在一起。勃羅代爾反復聲明，歷史學要成為某種有價值的東西，就必須與其他人文科學相結合，而這些人文科學也應該考慮歷史的層面。他對於人口史、地理史、經濟史等這些歷史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的部分，興致比對歷史學本身還要熱衷。在向人文科學靠攏以尋求新的認識能力、模式和方法時，勃羅代爾也有他與人不同的地方。他曾不無自豪地說：「費弗爾一定比我更像個歷史學家，他和布洛赫一樣，想把其他人文科學嵌入史學中；我並不想去殖民它們，而只是去拜訪，想去借它們的眼睛來觀察，借用一下它們使用的語言、它們的觀點，以豐裕我自己的部分。」[11]他這種不像一個歷史學家的地方，也正是他對歷史學的特殊貢獻所在。

我們說勃羅代爾把歷史研究引向廣泛，還有另一個層面的意思，這便是研究物件的擴大。他把《社會經濟史年鑑》改名為《經濟．社會．文明年鑑》，也反映出他力圖對歷史作更加全面的總體和綜合的研究。這種廣泛性在費弗爾那裏就有了。在他看來，固然可以根據文字的記載來再現歷史，「沒有書面史料，也可以，而且應該通過其他方面來再現歷史：語言、符號、風景、瓦片、田野形狀和雜草、月食、套牲口的軛、地質學家和化學家對石塊和佩劍所做的鑒定。總之，應該利用這一切來撰寫歷史：凡是人所有的、依賴於人的、為人服務的、表現人的、標誌人的存在、活動和生活方式的東西，都可以利用。」[12]如果說，費弗爾是把人及其全部活動都接納在史學範屬中的話，那麼勃羅代爾則進而囊括了一切。正如他夫子自道的那樣：「費弗爾說過，歷史，就是人；我則說，是人以及其他，一切都是歷史。」[13]

既然一切都成了歷史，那麼一切也就應在這個綜合體中得到確認。因為對人類文明一個片斷一個片斷進行孤立研究所獲得的片斷的知識，永遠也不能導致對整體的認識，並且這些片斷的知識本身也會因為

11 同註4。

12 引自阿法納西耶夫，〈「年鑑」學派基本理論的演變〉，《國外社會科學》1982年第5期（北京）。

13 同註4。

偏面而荒謬。歷史的研究物件在勃羅代爾那裏因而表現得恢宏，歷史既研究個別事件，也研究重複事件；既研究意識領域的東西，也研究潛意識領域的東西；既全面地反映沒有名姓的大眾的生活，又突出地表現那些掌握自身命運和歷史命運的傑出人物的貢獻。特別是，既研究歷史事件，也研究非歷史事件。

所謂非歷史事件，是指那些「驚人地持久和固定」的幾乎不變動的事實。從古以來，這些事實都被看作缺乏歷史的意義而被摒棄在史學的大門之外。勃羅代爾認為，像土地、氣候、生態環境等「十分耐久的實在」，因為長期存在而成為世代相傳、連綿不絕的恒在因素，它妨礙著或左右著歷史的前進，起著促進和阻礙社會發展的作用。並且，這種力量的限制幾乎是不可超越的，離開了這些因素，一切都成為問題，歷史可能遠不會是既存的這個樣子。所以，對這些要素的認識，也就成為了打開紛繁的歷史現象之門的鑰匙。正是由於勃羅代爾竭力要求，在歷史的舊名稱下接納這些從來被看作是非歷史的新事物，特別是他卓越的實踐，使這些非歷史的事實結束了無人照護的孤兒命運和沒有歸屬的流浪生涯，回到了歷史學款款酥軟的懷抱中。

三

勃羅代爾的總體歷史學不僅要克服狹隘性，樹立時間上和空間上的長遠意識；也不僅要克服片面性，運用多學科的方法，確立廣泛的研究領域；而且要克服平面性，把注意力由歷史的表象轉移到它的深處。勃羅代爾所以那樣鄙夷短時段，就是因為與此伴隨而生的歷史事件，不過是植根於長時段中的「模式」的表面現象而已。只有把短時段置於更加長久的、持續性的時間中，只有考慮到歷史事件在「結構」中的連續性或邏輯性，我們才能對這些浮在表面上的事件作出正確的解釋。這裏的「模式」和「結構」兩個概念的內涵，可以看作是勃羅代爾把歷史研究引向深入的表現。

「模式」在勃羅代爾那裏被看作是一種新的認識工具，是一系列緊

密聯繫的假設和解釋體系，它根據使用者的不同而具有多樣性。模式的時限有長有短，其意義和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的有效時段。「照我的主張，研究應該不斷從社會實在中得出模式，再從模式回到社會實在，多次往返，耐心地進行修補。因此，模式就先後由說明結構的嘗試、核對總和比較的工具，變成對某個特定結構的生命力和可靠性的驗證。如果我從現實出發創造一個模式，我就會立即把它放回到實在中去，然後在時間中向上追溯，盡可能追溯到它的誕生為止。接著，我將根據其他社會實在的共時運動，估量這個模式可能的有效時限（即到該模式與實在脫節為止）。」同時，通過其他實在與這一模式進行時間和空間上的比較，用這一模式去解釋其他歷史事件。

這種從單一的事件昇華到模式，再用模式解釋事件的方法，就是為了把我們的研究工作由歷史的表層轉移到歷史的深層。這不僅是因為，任何模式都不能由單一的事件所派生，而只能從一系列相互關聯的事件中抽象出來；模式的建立和運用，都意味著要綜合地看問題，意味著拋開表象的殊異而把握相同的本質。而且，眾多的歷史現象只有植根於特定的模式中，它們才不會再有飄忽不定的隨意性，才不會因為太多的偶然而難以把握，我們才能破識它的貌似獨特而賦予它以意義。

走筆至此，有必要針對我國的史學現狀說幾句話。或許有人會恪守傳統的信條，指斥勃羅代爾「模式」的主觀性。與此相近的胡適所謂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就在我國史學界受到過批判，迄今依然有人很不以為然。不錯，天才的假設中是難免幾分主觀成分的，勃羅代爾自己就說過，如果你不曾做過歷史的夢，你就不會成為一個歷史學家。但他無意表明模式可以向壁虛造，而認為取決於原始的觀察，取決於在所觀察的實在中，選擇那些基本要素和如何規定要素之間的關係。除此之外，他還特別強調對模式的檢驗。他形象地把模式比作船隻：「一旦船隻已經建成，我就要讓船隻下水，看它是否飄浮，然後沿著時間的長河順流而下或逆流而上。」通過不斷的修改使其臻於完善。勃羅代爾也反對濫用模式，反對將一些模式當作法則而固定下來。在他看來，「馬克思的天才，馬克思的影響經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從歷史長時段出

發，製造了真正的社會模式。」只是後來的一些人恪守這些模式，似乎它們能自動地說明一切和預示一切，似乎它們能適用於所有場所和所有的社會，才使得這一理論的生命力遭受到戕害。

「模式」可以看作是對深層結構的認識，「是當我們從長時期的觀點來探討歷史過程時所發現的那些持續的基礎模型。」[14]如果說模式是認識的歷史的話，那麼結構就可以看作是本體的歷史。對勃羅代爾來說，「結構是指社會現實和群眾之間形成的一種有機的、嚴密的和相當穩定的關係。對我們歷史學家來說，結構無疑是建築和構架，但更是十分耐久的實在。」結構是現實的一部分，是一種能干擾時間作用並改變其速度和範圍的現實。「所有的結構都同時既是歷史的基礎又是歷史的障礙。」它規定並制約著歷史，歷史只能在它的框架內展開，只能在它的舞臺上上演。他在《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中，所說的「限度」或「邊界條件」，就是結構的另一種表述：「在任何時代，包括我們自己所處的時代都會有這樣的邊界條件，它規定了什麼是可能，什麼是不可能的，什麼是通過些許努力就能做到的，什麼是無論如何都做不到的。」[15]

勃羅代爾所謂的結構，不僅包括人們通常所理解的物質因素，而且包括了心理構造和精神狀態。他堅信，在任何情況下，各深層要素之間都保持著確切而細微的關係，通過「突破觀察的表層，進入無意識（或少意識）的深層，再把無意識實在分割成等量的、敏感的和細微的要素」，通過精確地分析這些要素之間的關係，人們就能看到一般的結構法則。

勃羅代爾十分重視這些潛藏在引人注目的事件背後的結構，認為它比閃閃發光的表面事件有更豐富的內容。他自稱在歷史研究的方法方面，他是一個結構主義者。這與其說他體現了結構主義這個詞最流行的

14 高承恕，〈布勞岱與韋伯——歷史對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的意義〉，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之11《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1982），110。

15 《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1卷《日常生活的結構：可能和不可能》前言，譯文轉引自劉昶，《人心中的歷史》，315。

意義，毋寧是他對提供一個歷史時代的凝聚性和整體性的持久有機體——結構的重視。他說：「在上層發生的事，會流向下層，但不一定流得到，相反，在基層附近緩慢產生的事，一定會到達表層。」[16]所以，他提倡垂直的而非平面地看問題，並且特別關注那些不能輕易更移的根基。他認為只有這些常常遭遇不幸的底層，才是歷史的堅強基礎。為了加強對底層或基礎（他說：那是結構）的研究，他賦予了它極其重要的地位，認為說到結構，也就抓住了長時段。為了凸出長時段的地位，勃羅代爾是不惜以損害其他部分為代價的，許多對他的批評也就正緣於此。

應該說，這是一種必要的矯枉過正。因為單純注重事件的偏向由來已久，並且根深蒂固，而事件所以產生的原因特別是初始原因則往往被忽略。從解析結構出發，也就是拋開表面上人們的自由活動和選擇，探索在這背後潛伏著的制約因素。我們還可以說，深隱層次的那些模糊東西的制約力，比起那些直接的、明顯的力量更為重要，因為後者往往是由前者所派生的。即使這些模糊的東西在被探究確切之後，實際上並沒有我們所想像的那麼重要，那麼我們也不會失望，因為對歷史整體的認識，也本身就包括對這一部分的認識。

總之，由於勃羅代爾多元而辯證的時間觀的提出，使我們得以對歷史的認識層次化且深刻化。依此理路，研究物件的地理空間增大，內容也更加豐富，並且帶動了其他層面的整合，最終造成了「整體歷史」概念的出現。

*作者附記：本文初稿寫於一九八八年。這次修改發表，臺灣大學歷史系古偉瀛教授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意見。古教授還不厭其煩，多次為我惠寄臺灣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對古教授的高情盛誼，謹誌於此，以表謝意。

16 同註4。

A Multidimensional and Dialectical Concept of Time: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 on the Idea of Fernand Braudel

Xu, Zi*

Abstract

History is a science of time. But, as to how to handle the problem of time, no satisfactory answers were available until Braudel presented his concept of time. Braudel was an important figure of the Annales School. Based on his research, he theorized and systematized the concept of time, and presented a three tiered concept of time, that is, short, mid-range and long time. Correspondingly, he postulated event(a point of time), convergence(several scores of years of the converge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trends) and structure(long time ecolog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y. Looking at historical phenomena through this perspective, we can understand that history is no longer one dimensional and linear, but three dimensional. In other words, with the Braudel's concept of time, historians can now better treat historical problems.

Keywords: Fernand Braudel, Annales School, social history, concept of time.

（責任編輯：李國生　校對：黃惠貞　汪正翔）

* 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